

# 抗日战争时期 陕甘宁边区的新文字冬学运动

王元周

---

**内容提要** 近代以来,在西势东渐的压力下,中国人渐对民族文化失去信心,转而追求彻底的变革。文字改革,即以拼音文字取代汉字的主张也是这种反传统倾向的一种表现。随着时代的变化,这种主张越来越政治化,最终一部分共产党人成为这种主张的坚决拥护者和积极实践者,从土地革命时期开始进行新文字教育实践,在抗日战争时期更试图通过冬学等群众性识字运动推行新文字。陕甘宁边区于1940年开始在冬学运动中进行新文字教育试点,1941年冬学运动期间普及到全边区,然而很快于1942年冬学运动期间再次将新文字冬学实施范围缩小到延安县,随后停止了新文字推行工作。这次推行新文字工作的经验教训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从而影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文字改革。

**关键词** 抗日战争 陕甘宁边区 文字改革 新文字 冬学运动

---

汉字是中华文化的基石,“书同文”更曾是中国人的大同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到了近代,中国人对于自身文化传统的信心也因受一次次战争失败的打击而日渐削弱,代之而起的是日益强劲的西化潮流,以致对汉字也失去了信心,认为必须用西洋字母书写,改成拼音文字。

近代以来,关于文字改革必要性的论证动员了从理论到现实多方面的理由。在理论上,主要是从进化论出发,对文字也建立一元化的发展观,认为文字进化要经过图画字、义符字、声符字和字母四个阶段,从而得出结论说中国文字二千年来尚停留在第三阶段,需进行改革,以进入第四阶段。在事实上,主要认为中国文字繁难,阻碍了中国文化的进步。客观上,当时中国文盲众多,改革者苦于民众文化水平低,而无法将新思想普及到民众中去,所以他们希望能有一种简便易学的文字为载体,普及新思想,缔造新国民。

所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事实上,文字改革从一开始就与改革、革命关系密切。也正因为如此,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一些中国共产党人成为激进文字改革主张的提倡者和实践者,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之后。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拼音新文字普及教育试验。联系解放后中国的文字改革止于推广汉语拼音和简化字,而没有推行拼音文字的事实,分析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新文字冬学运动,揭示文字改革的政治化、革命化过程,以及文字改革所面临的思想和社会困境,从而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民族文化传统在近代国家再造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与存在的意义。

## 一 新文字的产生与苏区的教育实践

近代中国的所谓新文字运动,从广义上来说是指试图用字母文字取代汉字的过程。其实在中国,创造字母文字的努力由来已久,据传唐朝时就出现了守温德三十六字母,此后也一直有人在音韵学研究中使用,但是直到近代才发展成为具有社会影响的新文字运动。近代新文字运动与唐朝的字母已经没有了关系,也许与清末以来外国来华传教士用罗马字母拼切土音,或中国人仿照传教士的做法创作字母的努力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西方来华传教士主要以罗马字母拼切中国南方方言,自19世纪80年代起出现过苏州白、宁波白、上海白和厦门白的小册子。不久之后,广东人王炳耀、福建人蔡锡勇和卢愍章、江苏人沈学都等仿照教会的方法,制作字母。他们或出有单行刻本,或刊登在《时务报》、《万国公报》等新式报刊上,希望得到世人的承认和使用。<sup>①</sup>但是这些新字母影响很小,真正有一定影响,并曾付诸普及实践的,是20世纪初年王照所制作的官话字母。

王照是近代汉语拼音运动的著名人物,他于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于是专门从事汉语拼音研究,1900年冬仿照日文假名,采用汉字偏旁或字体的一部分,制定了一套汉字拼音方案,称为“官话合声字母”,次年在日本排印出版,1903年又在北京修订重印,名为《重刊官话合声字母序例及关系论说》。王照就说过,他的官话字母“全是为不认字的人兴出来的”<sup>②</sup>,所以在创作官话字母后,设法在不识字人群中加以普及。1904年应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的要求,教常备军第三镇官兵学习官话字母,王照还为此编写了字母和汉字对照的《对兵说话》教材。在袁世凯、严修、吴汝伦等社会名流的支持下,王照还在各地创办了官话字母义塾和简字学堂等传习机构,并创办“官话拼音书报社”,出版“拼音官话报”——《人人能看书》编辑出版了注有官话字母的《官话字母义塾丛刊》《拼音对文百家姓》《拼音对文三字经》《拼音对文千字文》《官话字母字汇》《官话字母读物》及《初学拼音官话书》系列(包括家政学、地文学、植物学、动物学)等。

自1905年起,劳乃宣对王照的官话字母加以增补,使之适合拼音中国南方口语,称为简字。1907年著《京音简字述略》并出版《简字全谱》,后来在端方等人的支持下,1909年在北京组织简字研究会,在南京创办简字学堂,又办简易识字学塾、简字讲习所等,积极提倡简字。在王照及劳乃宣等人的努力下,官话字母的影响在10年间遍及13个省。

继王照、劳乃宣之后,全国到处都有人创造新字母,出现的新字母有数十百种,在英国、意大利的中国留学生中也有人热衷创作新文字,甚至还有外国人参与其中。民国建立以后,一度注意王照的官话字母的袁世凯也有心进行文字改革,当时在中国从事独立运动的韩国著名儒学者李承熙听说后还曾上书袁世凯,建议他采用韩国的训民正音。<sup>③</sup>李承熙还编著《管文类表》整理训民正音的音韵,“以为万国通用之资而著之”。<sup>④</sup>

对于当时创作字母的人来说,大概有两种意图。一是希望用字母取代汉字,一是将字母作为认识汉字的辅助工具,或者认识汉字之前的便宜工具。此外,主张废除汉字者,往往主张采用国际统一的罗马字母,甚至主张以世界语取代汉语,而认为应当保留汉字者,有人主张像王照那样另创一套中国特有的字母。新文化运动中激进知识分子多主张废除汉字,采用罗马字母,如陈独秀主张先

① 相关内容参见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上海书店1990年影印版;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时代出版社1949年版,上海书店1990年影印版。

② 《注音字母读物(八种)》,三字经,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版,第3页。

③ 《韩溪遗稿》七,(韩)国史编纂委员会,1980年版,第505页。

④ 《韩溪遗稿》七,第560页。

废除汉字，暂且保留汉语，而钱玄同则进一步主张废除汉语，采用世界语。1923年钱玄同、赵元任、林语堂、黎锦熙等在《国语月刊》的“汉字改革专号”上发表文章，主张“汉字革命”，提出应以罗马字（拉丁字）代替汉字，而且还为此作了一些努力，编了一些相关书籍。不过北洋政府教育部召集的读音统一会还是认为汉字不可废，并参照王照的官话字母等，用中国古字的偏旁笔画制作了“注音字母”，以为汉字注音，于1918年正式批准实施。

然而主张采用罗马字母的呼声依然不断高涨，以致北洋政府教育部不得不于1923年8月召开国语统一筹备会，决定组织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1926年，制定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1928年9月时任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正式予以公布。但是国语罗马字在当时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同注音字母一样仅用于给汉字注音，并非要取代汉字，也没有在社会上真正推行，影响甚小。真正将这一方案加以改良和发扬光大，并付诸教育实践的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些人士。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许多中共党员到了莫斯科。受十月革命后苏联用新字母拼写境内少数民族语言，以及苏联帮助蒙古以新字母书写蒙古语做法的影响，吴玉章和瞿秋白在莫斯科经过一年的研究，最后由瞿秋白写成了一本名为《中国拉丁字母》的小册子，将其作为中国新文字。此后，狭义的中国“新文字”就是指这种汉字拉丁化方案。

1931年9月26日，中国工人在海参崴中国大戏园召集了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表示欢迎这种中国新文字。为了在工人中普及这种新文字，吴玉章、林伯渠、萧三、王湘宝等人和一位苏联语言学专家一起经过几天的讨论，在原来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然后由吴玉章、林伯渠等人在苏联远东地区的华工中加以推行。

这种新文字传到国内以后，鲁迅备加推崇，他在《门外文谈》和《中国语文的新生》中强烈主张使用新文字。蔡元培、孙科等700余名赞成新文字的人发表宣言，说“汉字如独轮车，国语罗马字如汽车，新文字如飞机”。1933年以来在上海、北平、广州、香港、厦门各地都有热心人士广为提倡，天马书店出了不少教本和丛书。

但是在主张文字改革的阵营内部也引起了国语罗马字与汉字拉丁化的尖锐对立，两派长期互相争论，尤其是1934年讨论文艺大众化的时候，对于拉丁化新文字进行过热烈的讨论。这场争论由于新文字运动越来越强烈的政治和党派色彩也超出学术的范围，国民党政府将中国共产党人所主张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视为“赤化”运动，甚至有人将其视为洪水猛兽，认为推行新文字之祸甚于亡国，不允许在国统区公开地搞新文字运动。<sup>①</sup>

就当时主张汉字拉丁化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他们也确实将文字改革与革命联系起来思考，即不仅像新文化运动时期那样将废除汉字与反对所谓旧文化相联系，而且将废除汉字与劳动大众，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紧密地联系起来。他们认为中国汉字是古代与封建社会的产物，已经变成统治阶级压迫群众的工具之一，实为中国人民识字的障碍，已经不适于现在的时代，所以要根本废除作为象形文字的汉字，创造通俗化、劳动大众化的文字。他们相信拉丁化是最科学的方案，因为世界各国文字都要走拉丁化的道路，甚至相信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后，必然会形成某一种统一的语言文字，其构成要素一定是拼音文字，而绝不会是方块的汉字。因此，中国如果不愿自居世界之外，就必须进行彻底的文字革命，废除方块汉字，而代以拉丁字母书写的拼音文字，废除四

<sup>①</sup> 吴玉章：《新文字在切实推行中的经验和教训——在新文字协会第一届年会上的报告》，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4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49页。

声,以合世界潮流,反对注音字母之类的改良办法<sup>①</sup>,以为“也只有这样才能发展形式是民族的,而内容是国际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工人及劳动者的文化”。<sup>②</sup>因此,他们将文字改革视为文字革命斗争,甚至连将拉丁化视为初级教育工具的态度都被批判为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态度,“统一国语运动”也被看作资产阶级的运动,以为不能以一个地方的口音作为全国的标准音。这样,文字改革被纳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此后新文字运动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旗帜,不少共产党人将推行新文字视为自己的历史使命。

土地革命时期,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这种强烈的党派色彩使其不能在国民党统治区推行,其教育推广实践自然只能限于苏区。当时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中的工农干部有很多人是文盲,又不能经常上课学习,要想他们达到能看懂文件的水平,需要学习几年汉字才行。所以当时瞿秋白、林伯渠在江西苏区积极提倡新文字,尤其是对于文盲,主张先学新文字。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的各种学校也曾进行过新文字教育的实践。红军大学进行的新文字教育实践证明,文化程度越高的人排斥性越强,而一部分文盲经过两三个月的学习就能用新文字写报告,写墙报。<sup>③</sup>所以有文章提出:“一切能用汉字写读的人们,不是教学新文字的对象,不应该拿新文字去麻烦他们,如果拿新文字去麻烦他们,不独妨害他们的工作,而且引起他们对于新文字的反感,对于新文字的推行没有帮助。”<sup>④</sup>这种实践活动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仍在继续,并与全面抗战爆发后推行新文字的教育活动紧密相连,下面即重点论述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尤其是全面抗战爆发以后陕甘宁边区冬学运动中的新文字教育。

## 二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新文字冬学

在全面抗战爆发前,陕甘宁边区也曾推行新文字教育。当时中国共产党认为,要想将陕甘宁边区建成民主抗日的模范区,必须把广大群众从文盲中解放出来,进行普及教育,而“最基本最易学的新文字应该在最短时期普及到历史上没有参加过文字生活的男女文盲,但不停止在这一基本的工具上,应该利用这一基本工具,学习汉字,以及学习政治和科学”。<sup>⑤</sup>在向来热衷推行新文字的林伯渠等人的推动下,在各种学校中普遍推行新文字教育。徐特立在江西苏区本来反对推行新文字,这时也开始搞新文字教育实验,并慢慢热心起来。1936年冬天,徐特立开始在延安用新文字教育残废军人和小学教员,并用新文字办学校。这样,新文字运动就在各处发展起来。

据有关材料显示,当时推行新文字教育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杨柳曾是徐特立所办夜校的学员,他当时是个勤务员,通过不多日子的学习就会用新文字写信、做记录,后来他利用新文字学习汉字,学会了用汉字写信,成为学习新文字的典型。<sup>⑥</sup>另据《新中华报》报道,陕北推行新文字教育不过半年,就使偏僻乡村中认识新文字的人数比认识汉字的人更多;延安市工会所办夜校学生90%不识汉字,“每晚上新文字课一点半钟,不过两星期,大部分学生自己能拼能写能读,尤其是写法特别进步”。<sup>⑦</sup>为了推进新文字教育,1937年5月还计划开办教员训练班,将新文字也作为训练班的中心

① 吴玉章:《文学革命与文字革命》,《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4辑,第395页。

② 吴玉章:《新文字与新文化运动(续完)》,《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4辑,第324页。

③ 《对于教学新文字的意见》,《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4辑,第11页。

④ 《对于教学新文字的意见》,《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4辑,第11页。

⑤ 《关于群众的文化教育建设草案》,《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4辑,第15—16页。

⑥ 《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成立大会盛况》,《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4辑,第395页。

⑦ 《对于教学新文字的意见》,《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4辑,第11页。

科目。<sup>①</sup>

但是当时并没有用新文字彻底取代汉字的决心,而是像上面提到的杨柳所表现的那样,最终将新文字作为学习汉字的辅助工具。陕甘宁特区文化教育建设委员会起草的《关于群众的文化教育建设草案》也是将新文字作为辅助工具,要求能利用新文字学习汉字及学习自然和社会常识,最终还是要求学员能用汉字写信及作报告。<sup>②</sup>而且,也有材料显示民众对学习新文字并不十分热心,有的将新文字误认为是外国文而不愿意学习,并且这种没有意义的字母和拼音对于文盲来说也不容易记忆,有的花了很多时间而没有成绩,所以中央教育部出版的新文字看图识字,把字母拼音和读本联系教授,希望能藉此改变这种状况。<sup>③</sup>

全面抗战爆发后,新文字教育因群众教育运动的发展而更受重视。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号召进行一次识字突击运动,于是各地组织识字组,开展了一次以国防教育为主题的冬学运动,动员成年和青年文盲利用冬闲时间来学习识字。这次冬学运动取得很好的成绩,<sup>④</sup>此后便年年开展。尽管如此,三年来开展冬学运动的实践也证明,要想在短期内扫除文盲是很困难的,一些人认为主要障碍还是在于汉字难学难记<sup>⑤</sup>,于是又想到了新文字。1940年吴玉章写信给中共中央宣传部,建议推行新文字。当时不仅有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等几位老同志热心于推行新文字,高岗、罗迈等人也表示拥护,所以中宣部经过讨论后一致赞成推行新文字,并写信给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要求在1940年的冬学中开始实行,规定对15岁至25岁的文盲要用新文字来进行教育。林伯渠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这时下决心要在陕甘宁边区用新文字扫除文盲。

1940年9月2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有关冬学的扩大会议,正式决定本届冬学除一般县份仍用汉字课本外,在延安县、延安市,改用新文字课本,举办新文字冬学,作为试点,以便下一年大量推广。<sup>⑥</sup>要大规模推行新文字教育,自然首先要培养大量教师。当时在延安成立了新文字运动委员会,该委员会商得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以及陕北公学、马列学院、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女子大学、边区党校和一些机关单位同意,抽调70余名干部成立新文字训练班,由吴玉章亲自对他们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培训。<sup>⑦</sup>延安妇联派来的一位不识字的十八岁农村姑娘周子桂经过一个月的学习,就能用新文字写信。<sup>⑧</sup>11月7日学员毕业后,被分配到延安县和延安市各地以新文字试办冬学,进行扫除文盲的工作。董必武号召热心新文字运动者要以传教的精神来发展新文字运动。<sup>⑨</sup>11月7日,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等几位老同志发起的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也正式成立了。这一天正好是十月革命纪念日,吴玉章在成立大会上还特意强调这种巧合表示了中国文字革命的伟大意义。该协会“以团结边区及全国新文字工作者推广新文字运动,提高大众文化,争取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为宗旨”。<sup>⑩</sup>选举毛泽东、朱德、孙科、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等人为名誉理事,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艾思奇、杨松、周扬、萧三、罗迈等46人为理事,还一致

① 《小学校教育制度暂行条例草案》,《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4辑,第25页。

② 《关于群众的文化教育建设草案》,《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4辑,第17页。

③ 《对于教学新文字的意见》,《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4辑,第13页。

④ 《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1941年4月)》,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辑,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第216页。

⑤ 《本届冬学新决定》,《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4辑,第387页。

⑥ 《本届冬学新决定》,《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4辑,第387页。

⑦ 另据吕应利,《关于延安新文字干部学校》(<http://yayjzx.nceae.net/yabts/wdwz/ysj/88.htm>),实际学习了一个半月。

⑧ 《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成立大会盛况》,《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4辑,第391页。

⑨ 《延安新文字运动委员会讨论消灭文盲推广新文字办法》,《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4辑,第380页。

⑩ 《边区新文字协会简章草案》,《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4辑,第386页。

决定以11月20日为“中国文字革命节”。<sup>①</sup>协会成立后,首先协助边区政府开展延安市、县的新文字冬学运动,并陆续出版发行《新文字报》和一些新文字课本、读物,在陕甘宁边区各地成立分会,帮助边区建立新文字干部学校,培养新文字干部。<sup>②</sup>

在1940年的冬学运动中,受过培训的70多名新文字教员在延安市和延安县举办了63个新文字冬学(其中女冬学6个),有1563人参加学习。经过50天的教学,考核成绩为甲级的有561人,乙级的有219人,丙级的有462人,丁级的有321人。其中甲级能达到会用新文字读写的程度,最低的丁级也能达到用新文字拼写单字的程度。<sup>③</sup>当时延安《解放日报》对于新文字教育的成绩也进行了报道,称赞其成绩惊人,在学了50天新文字之后,1500多个文盲之中已有700多个能够自由的读和写,许多冬学学生成为《新文字报》的通讯员。<sup>④</sup>1941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中 also 说,在40天的时间里,1400多名青年和成年学生,半数以上能用新文字写信、读报,新文字受到学生们的欢迎。<sup>⑤</sup>总之,大家对这一成果表示满意。在这届新文字冬学结束后,新文字训练班总结了这次新文字冬学工作,并举办了新文字冬学工作展览汇报会,张闻天、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参观了展览,并肯定了他们的工作成绩,毛泽东还勉励新文字工作者要“努力推行,愈广愈好”。

有了这次新文字冬学试点的成绩,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在新文字训练班的基础上成立新文字干部学校,由吴玉章任校长,景林任副校长(1942年夏景林调离后由王志匀接任),原训练班毕业生50多人被编入高级班,另外从边区部分县市招收了一个初级班,还为其他热心学习新文字的干部和群众举办过速成班、讲习班。

对于推行新文字教育,林伯渠认为首先要解决三方面的问题,一是说服知识分子认可新文字,二是在法律上给新文字以合法地位,三是教育群众接受新文字。为了解决第一个问题,1940年12月2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给新文字以合法地位,规定可以用新文字写报告、递呈子、记账、打收条、通讯等一切用途,在法律上与汉字享有同等效力,政府的法令公告等重要公文文件,也要一面印汉字,一面印新文字,并将这一决定以布告的形式予以公布。1941年5月1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提出,经中共中央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也将扫除文盲,推广新文字教育作为陕甘宁边区最重要的文化政策。<sup>⑥</sup>该施政纲领经边区参议会通过后,新文字的合法地位进一步得到保障。1941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再次出布告,重申新文字与汉字享有同等地位。1941年6月5日《解放日报》社论《推行新文字与扫除文盲》也强调“新文字不仅在扫除文盲普及教育上是锋利的武器;而且在提高文化发扬学术上,它也是比汉字更高一级的文字工具,这是一九三三年以来大众语论战中得出的结论;也是中国前进的文化界所一致承认的真理,曾经鲁迅一再解释过的”。<sup>⑦</sup>在1941年的一段时间内,中央通讯站仍不收发用新文字写的信件,新文字报对此点名批评,严正指出这种行为违反了政府法令,中央通讯站于是也开始收发用新文字写的文章。<sup>⑧</sup>

① 《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成立大会盛况》,参见《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4辑,第398页。

② 《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成立大会盛况》,《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4辑,第391页。

③ 参见前引吕应利,《关于延安新文字干部学校》一文。

④ 《边区四年来学校教育猛烈增加》,《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4辑,第452页。还有一篇报道所提供的统计数字似乎也较精确,指出在40天教学之后,1563名毕业生中有561人学会了用新文字自由读写日常用语,如果加上基本上学会读写(迟缓,偶尔有错误)的在内,共有780人(《开展冬学运动》,《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4辑,第619—620页)。

⑤ 《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1941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辑,第218页。

⑥ 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77页。

⑦ 《推行新文字与扫除文盲》,《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4辑,第448页。

⑧ 肖云:《新文字冬学里的几个问题》,《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4辑,第621页。

1941年6月,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决定在该年度全区冬学运动中推广新文字,绝大部分冬学要教新文字。为加强对1941年全区新文字冬学运动的领导,1941年10月18日陕甘宁边区教育厅还邀请西北局、保安司令部、边区青年救国会、边区妇联、边区总工会、新干校等有关机关,联合成立冬学委员会,并讨论了扫除干部中的新文字文盲问题,要求青教保证60%的乡级干部入学,妇联保证50%,工会保证50%的干部入学。<sup>①</sup>1941年10月24日《解放日报》发表《开展冬学运动》的社论,希望“在抗日根据地的冬学里都能够试验以新文字来进行教学,把这一个‘老百姓翻身的武器’真正的交到广大人民的手上,使广大人民能够更好的用它来加强自己战胜敌人,在战斗中把广大人民这一个无限丰富的文化源泉更好的开发起来!”<sup>②</sup>

为解决在全边区推行新文字冬学所需的大量师资问题,早在1941年夏天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就利用暑假分别在延安、定边、庆阳、关中及绥德等地各示范中学内开办小学教师讲习班时,即在课程中加进了新文字教材研究,加强新文字训练,作为将来在全边区推行新文字教育的准备。6月下旬,延安新文字干部学校又从高级班抽出38名学员,组成13个工作辅导小组,分赴边区4个分区和直辖的9个县市,举办了13个新文字教员训练班,参加学习的有626人。到11月10日前后各训练班结束,各工作辅导小组继续留在各地指导新文字冬学工作。<sup>③</sup>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也派许多干部到各县去帮助政府训练推广新文字冬学和小学的教员。经过努力,1941年陕甘宁边区冬学教员数量大约是1940年的10倍。据此,吴玉章乐观的估计,这些教员大概可以扫除1万多个文盲,这样经过四五年的努力,陕甘宁边区的文盲便可扫尽。<sup>④</sup>

实际上,1941年冬学运动期间陕甘宁边区共办新文字冬学238个,其中女冬学23个,参加学习人数达5712名,其中女生(缺志丹县)621名。<sup>⑤</sup>此外,地方工厂和部队办的冬学也有教授新文字的。所以,1941年的冬学运动可以说是陕甘宁边区推行新文字教育的最高潮。受此鼓舞,陕甘宁边区政府规定,各地有新文字教员者,应一律教新文字,不得新文字、汉字混合去教。<sup>⑥</sup>

但是到举办1942年冬学运动时,边区政府却决定缩小举办新文字冬学的范围,只在延安县继续试办新文字冬学,教员由新文字干部学校派遣。当年新文字干部学校在高级班学员中选派了20名新文字冬学教员,5名新文字冬学辅导员,在延安县举办了14个新文字冬学,其中女冬学一个,半日冬学一个,计划招生650名。此后新文字冬学似未再举办。1943年春延安新文字干部学校也被并入延安大学社会科学院,成立新文字系,随后停办。

### 三 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冬学停办的原因

关于新文字冬学停办的原因,现在还没有找到能够明确说明原因的材料,但是也有材料显示,新文字和新文字冬学本身存在许多问题,也许能够帮助我们从侧面理解新文字教育难以存续的原因。

首先,从冬学运动本身来说,冬学不仅是扫盲的识字运动,也是一项群众运动,是抗战动员的组

① 《边区冬学委员会成立》《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4辑,第616页。

② 《开展冬学运动》《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4辑,第620页。

③ 参见前引吕应利,《关于延安新文字干部学校》一文。

④ 吴玉章:《新文字在切实推行中的经验和教训——在新文字协会第一届年会上的报告》《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4辑,第648页。

⑤ 参见前引吕应利,《关于延安新文字干部学校》一文。

⑥ 《本年教育中心工作》《解放日报》1942年1月5日。

成部分,目的是要加强学生对于革命和战争的认识,而并不是出于民众自身追求知识的要求。1938年陕甘宁边区冬学的主要科目就是政治、识字、唱歌和军事。1941年10月24日《解放日报》社论《开展冬学运动》中也强调:“冬学的任务,总的说来就不能不与抗战、民主的现实任务相适应、相配合,并成为进行抗日战争与民主建设的一个战斗的侧翼。”<sup>①</sup>所以,在陕甘宁边区开始办冬学的时候,基层干部主要动员儿童入学,而青年和成人很少参加。动员青年人入冬学相当困难,群众以为冬学就是扩大抗日军队的巧妙办法,如果入了冬学便要当抗日军人,所以无论如何不肯把青年送入冬学。<sup>②</sup>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举办者不得不要求干部子弟率先入冬学。1944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今年冬学的指示信》也说明过去冬学不能开展,多不为群众所欢迎,不是自愿和劝学,而是强迫动员,引起群众反感,群众视冬学如一种负担。<sup>③</sup>

但是冬学毕竟不是直接的政治运动,所以有些领导干部也认为冬学不是政治工作,无须重视,或者将冬学工作看成捎带工作,不是自己的本职任务。1940年陕甘宁边区冬学运动中,有几县的三科长去做了征粮组长,冬学委员会工作无人主持,以致冬学工作完全垮台。固临县在开办冬学时,就把三科长调去作征粮工作。<sup>④</sup>上述《解放日报》社论《开展冬学运动》中也承认陕甘宁边区开展冬学运动三年来所收到的效果跟工作中所投下的人力和物力比较起来远不相称,许多冬学学生今年毕业,明年来时依然是个文盲。除了认为汉字难学难记是其中原因之一外,地广人稀,使用文字机会太少也是重要原因。<sup>⑤</sup>可见当时乡村生活中并非普遍存在着文字生活的需要,这种需要主要来自乡村社会外界。

其次,新文字自身所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肖云撰文指出,老百姓初接触新文字时一般都持怀疑态度,不接受新文字,学会以后才会逐渐改变态度,最终热心拥护新文字。<sup>⑥</sup>但是这种态度转变是否普遍存在也值得怀疑,因为另有材料显示,有人认为学了新文字也没有用处,不如拿这时间来学汉字。他们相信新文字只是帮助人们学习汉字的辅助工具,可以让老年人去学,青年人记忆力强,应该学汉字,不应拿新文字来耽误他们。虽然热衷推行新文字的人对这种认识反复加以批驳,但是他们自己也不主张即刻用新文字取代汉字,一般民众更没有多少人认为或者相信新文字要取代汉字。而知识分子更认为新文字是粗俗的,不过是下层群众勉强使用文字的初级工具,至于高深理论和优美文章非汉字不能表达,拉丁化将断送中国文化。

再次,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全盘西化的激烈反传统主张逐渐式微,一些人逐渐认识到民族文化的复兴是民族复兴的重要条件。到抗战时期,这种倾向更加明显,民族的也成为共产党所追求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要特征。那么,那种以西化为唯一价值取向的,认为所有文字都必然走向拼音文字的观点,与日益强烈的民族化潮流存在着潜在的矛盾。而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主张以新文字取代汉字的人在推行新文字的同时,并不能真正创作出使用新文字的新语言、新文学和新文化,为新文字的存在提供一个社会生活环境,所以处于社会下层的文盲在学了新文字之后不仅不能享受更高一级的文化,反而觉得在社会上无用武之地,很难参与民族文化的享用和再生产过程。虽然不识汉字的文盲在当时人口中占大多数,但是他们在文化上处于劣势,没有发言权,他们学了新文字后也同样难以改变这种处境,所以新文字并不因为推行对象的人数众多而就容易推行。

①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4辑,第618页。

② 《克服冬学运动中的错误认识与不良倾向》,《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4辑,第33页。

③ 《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今年冬学的指示信(1944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417—419页。

④ 《开展冬学运动》,《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4辑,第619页。

⑤ 《开展冬学运动》,《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4辑,第619页。

⑥ 肖云:《新文字冬学里的几个问题》,《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4辑,第621—622页。



不仅如此,由于在普通群众中推行新文字教育,使他们接受与一般知识人所学的汉字不同的文字,反而会加剧社会上层与下层的分裂和隔绝。当时并不存在能够在全中国迅速完全废除汉字的环境,如果真的像一部分人所主张的那样,只在乡村推行新文字,在知识社会仍通行汉字书籍和刊物,而在乡村中通行新文字书籍和刊物,那么即使在边区乡村普及了新文字,也只能使乡村社会进一步边缘化,扩大和固化社会的这种上下隔绝,两截分化的状态。

主张推行新文字的人还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文盲是由社会环境造成的,而不是汉字造成的,而汉字的存在比这种社会环境的存在更为长久和稳定。谢觉哉说:“我们中华民族四万万五千万人民身上有一个很大的负担,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好像过去文庙乌龟身上那块石碑一样,简直把我们压死了,这个负担就是汉字。从前我们认为汉字是个宝贝,现在我们才知道汉字使得我国大多数人愚昧无知,我们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但是汉字是和封建势力联系着的,封建势力反对新文字,还反对白话文,也反对马克思的辩证法,这是一贯的。和这相反,在政治上真正革命的人,在文字上也是主张革命的。”<sup>①</sup>谢觉哉的这种认识在当时主张推行新文字的林伯渠、吴玉章等人那里也同样存在,他们都是将文字改革与阶级联系起来,从而使其成为革命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从学术上来论证改革的必要性的。

因此,虽然陕甘宁边区政府可以决定新文字与汉字有同等合法地位,但是林伯渠所说的说服知识分子和教育群众接受新文字的工作并不容易完成,更难以为新文字创造出一个社会文化生活环境,新文字普及教育运动势必难以成功。

#### 四 结语

近代以来,在西势东渐的压力下,西化成为中国人追求的基本目标,而西化程度的不同也就成为保守与进步的重要指标。也正因为如此,许多问题在那个时代被泛政治化了,汉字改革就是这样的问题之一,它越来越政治化,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主张的组成部分,即使在中国,乃至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价值取向开始转向民族传统时,在这一领域的转变也相对滞后,解放后的文字改革仍用拼音文字取代汉字为最终目标。只是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国内形势的变化,以及文字改革工作自身的困难,这一目标并没有实现,否则今天中国文化发展的情形如何,也是难以想象的。

中国周边的朝鲜、日本等国在近代也同样经历了文字改革的过程,但是这些国家的总体倾向是将汉字作为外来文字加以废除,代之以民族文字。即便如此,日本也未能彻底废除汉字,朝鲜和韩国废除了汉字,但是对民族文化发展也带来负面的影响,如今又提倡汉字教育。汉字本来就是中国的民族文字,很难与民族主义联系起来,所以中国文字改革的原动力最终落在了阶级斗争理论上,这也就使中国的文字改革日益政治化,最终成为政党的革命主张。然而民族国家的建立,离不开民族文化,废除汉字这种极端化的主张与这一整体任务之间存在矛盾,这大概是新文字终未能取代汉字的根本原因。

(作者王元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李仲明)

<sup>①</sup> 《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成立大会盛况》,《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4辑,第395—396页。